

当代中国外交：70年的探索与启示*

宫 力

摘 要：独立自主原则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中国外交宗旨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变迁，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形成良性互动，是对时代主题认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逐步转变相适应的变化过程。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历经70年的当代中国外交表明：与日俱进和外交理论创新对中国外交实践起到了引领作用；把握好反霸和维持同霸权国正常关系之间的分寸至关重要；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拓展了中国外交空间；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关键词：独立自主 中国外交宗旨 外交变迁 中国外交核心理念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9)04-0001-18

当代中国外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运用智慧和谋略，通过和平方式，为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所进行的国家间的官方往来活动。走过70年风雨历程的当代中国外交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艰难曲折。认真研究当代中国外交理论、思想、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和方针的历史演进以及当代中国外交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独立自主：贯穿当代中国外交的一条红线

自1840年到1949年一百余年的中国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史，从晚清到民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VZL016）的阶段性成果。

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的中国一直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①受尽列强的欺凌。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②新中国成立伊始，立足未稳，面临着西方的军事威胁和战略压力。摆脱旧中国半殖民地屈辱外交的影响，成为新生政权的当务之急。中国领导人把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原则运用到当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之中，在总结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外事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重要的对外政策与方针，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概括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职能，即“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③这个规定，展示了中国外交新的风貌：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和战争，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通过实施“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④外交方针，帝国主义在中国各领域存在的特权和势力被彻底清除，由此维护和巩固了新中国的独立与主权；通过实施“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和“团结世界人民”^⑤的外交方针，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为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世界各国重新建立新型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创造了基本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美苏冷战对抗的两极格局下，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战略方针，“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

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第18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95页。

④ “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针对“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79页注释。

⑤ “礼尚往来”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而“互通有无”是指“我们开国以来就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消费市场。”“团结世界人民”是指“我们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①以此打破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包围。对于中苏同盟，周恩来指出：“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②总之，“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③毛泽东一再强调：“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④事实上，在中苏同盟的背景下，中国始终如一维护独立自主地位，维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有了新的内涵。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宣布：“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⑤在此基础上，中国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⑥由此结束了中国外交结盟的历史，真正实行不结盟、不打牌，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全方位和平外交，突出了独立自主的特色，从而维持了国际战略力量的平衡，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充分肯定“不结盟”“全方位”外交的意义，并不是否定在此之前的中苏同盟和“一条线”的准结盟做法。这是因为，真正要做到不结盟、全方位的外交需要必要的条件：一是和平发展的趋势要成为主流，并且不可逆转，世界大战真的打不起来；二是中国的实力要发展到不需要请“帮手”（与外部大国结盟），就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三是要有外交理念、观念的更新作为支撑。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这才有了中国外交战略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调整。

当今国际社会依然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总体上看依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特别是全球的战略态势依然是西强东弱，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盛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依然面临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压力，中国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②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3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页。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7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40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反对外来干涉、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任没有结束而是任重道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①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决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等六个方面。^②“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③

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和主张，不仅引领当代中国外交走过了70年的艰难征程，并且还将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向全面纵深的方向持续推进。

二、中国外交宗旨：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变迁

捍卫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当代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面临着西方的包围封锁和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是当代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长期以来在中国外交宗旨中占据突出位置。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今天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务。”^④

新中国成立后同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较量和斗争，迫使美国改变错误的对华政策，1972年2月28日，《中美上海公报》首次确认：“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⑤这是通过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到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中苏关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国的和平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3页。

⑤ 中美《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第1版。

在20世纪60年代由同盟走向破裂，主要原因是苏联对华奉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不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时所指出的那样：“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①中国在与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逐步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战略力量。

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反对霸权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②维护世界和平始终是中国外交宗旨的重要内容，至今未有改变。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对来访的外国客人指出：“争取和平是我们共同的目的。”^③为此，中国于1953年最先提出，并于1954年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④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项长期的方针，在中国外交70年的实践中，为化解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推动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鉴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奉行对外扩张的政策、推行霸权主义的教训，中国明确提出了永远不称霸的主张。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宣布：“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⑤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世界局势相对缓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增强，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紧密相连，相互依存度增大，促使各国积极寻求国家间的合作而不是对抗。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宗旨的表述由“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逐步调整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1994年11月15日，江泽民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如何更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把一个和平、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295页。

② 同上，第5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页。

④ 主要内容包括：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第1版。

繁荣、美好的世界带入21世纪，是当前各国人民正在严肃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一代领导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①这里首次把促进经济发展与维护世界和平并列起来进行表述，这是一个重大变化。1997年7月1日，江泽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上指出：“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推动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积极贡献力量。”^②在这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已有了连贯、完整、正式的表述。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③在中国外交宗旨的表述中去掉“反对霸权主义”的提法，并不是中国不再反对霸权主义，而是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霸权主义已不再是世界主要矛盾，因此不必再刻意突出强调这一点。另外，“维护世界和平”中已包含反霸的深刻内涵，和平不是自动到来的，需要与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作必要的斗争才能实现。在中国外交宗旨中增加“促进共同发展”这一重要内容，是中国领导人在和平与发展新趋向的基础上，做出的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改变，直接回应了时代主题和世界人民注重发展的呼声和需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江泽民在总结13年历史经验时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④列为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之一，并且明确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⑤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⑥中共十八大、十九大都重申了这一点。

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使中国外交展现出新的面貌。一方面，维护世界和平是各国共同发展的必要前提。中

①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页。

② 同上，第657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29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⑤ 同上，第36页。

⑥ 同上。

国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①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维护亚洲和平和世界持久和平的创新思路。另一方面，共同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和普遍安全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障。“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②中国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③因此，中国外交在新时代更加注重以共同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

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国外交越过急流险滩

处于冷战时期的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在抵制美国反华政策，支持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斗争，抵制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政策方面，取得很大成效，坚决维护了中国独立自主地位。但是，在全局筹划和策略运用方面，也存在需要检讨之处。例如，中国在对美政策方面，过于僵化，坚持“一揽子”解决方案，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在与苏联关系方面，没有留下回旋余地。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与美苏两个大国同时对抗，在战略态势上处在不利的位置。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把争取“中间地带”^④国家放在重要的外交日程，并在争取“中间地带”，特别是在争取第二中间地带^⑤方面有理论上的突破，打破了西方阵营铁板一块的传统观念，深入剖析了美国与中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并且提出中国与这些中等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一定的共同点，彼此相互需要，它们是中国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这种分析清除了中国同中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心理屏障。中国为改善同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的进展。中法建交是重要突破，但不足以改变中国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因为像法国那样敢于与美国唱反调的国家太少，

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56页。

③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④ 指处于美苏之间的辽阔地带：亚非拉。

⑤ 指西方中等资本主义国家。

大多数国家还是看美国的眼色行事。

面对严峻的国际局面，中共党内有一些同志感到需要调整对外政策。1962年，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提出建议，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都集中到中国来。在中苏关系方面，要防止双方斗争直线地尖锐下去。同年6月，王稼祥针对当时对世界战争估计过高的论点指出：“不要过分地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①在此之前，王稼祥还在他审定的一份提纲中提出：“我们应该支持别国的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但又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②这些都是外交战略方面切中时弊的真知灼见。

但在当时，毛泽东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比较悲观，因而否定了王稼祥的建议。中国的国际环境持续紧张。在实力相对虚弱的情况下，中国与美苏关系同时恶化，限制了中国外交的拓展空间，并且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央文革煽动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形成干扰，外交纠纷不断，直至发生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的恶性事件。这就使中国面临的外部危险更加严重。

在困难、险峻的局面下，毛泽东、周恩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对外政策，着手解决对外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中国高层开始采取措施纠正外交方面的失误，并阻止中央文革小组对外交工作的干预。1967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将王力、关锋^③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④也被隔离审查。至此，中央文革小组染指外交部的局面受到限制，外交失控的现象基本上得到控制。此后，江青集团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削弱，周恩来重新掌控外交部，并直接对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负责，由此逐步恢复了外交的正常秩序。与此同时，纠正极“左”思潮对外交的影响也取得初步成效。1968年5月16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样的对外宣传口号，并且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⑤随后，毛泽东又于5月29日在外交部《关于加强

① 《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页。

② 同上，第445页。

③ 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④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⑤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

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上，做出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①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推动下，外交整顿初见成效，并为中国外交战略的深度调整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在国际战略格局深刻变化的基础上，毛泽东把握机遇，深度调整了外交政策，逐步形成了“一条线”的战略^②和“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③实质是要建立一个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依靠第三世界，争取和团结第二世界，对第一世界的美苏区别对待，缓和中美关系，集中力量应对主要威胁，由此打造反霸新格局。这一战略调整体现出外交新思维。首先，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是当务之急，美国由此成为一支可以合作的力量。^④这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具有决定性意义。其次，第二世界成为中国争取和团结的对象，改善了中国和中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最后，毛泽东发展和充实了第三世界的内涵，为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在调整、变化中越来越体现出灵活务实的特点。这主要在于毛泽东晚年仍然警觉地注视着国家的安全，而外交方面的失误（主要是60年代），也是由毛泽东本人发现并开始反思纠正的。由此才有了对外战略的大调整。当时中国公开使用的外交语言充满了激烈的革命色彩，但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政策却正是在这种革命高调中（毛泽东把这叫做“放空炮”），在不被人注意的潜流下，逐渐发生着重大的变化。^⑤毛泽东在1973年2月同基辛格的谈话中指出：“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不讲不行呢。”^⑥表面“激进”，实际“灵活”成为调整后的中国外交的重要特征。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32页。

② 由于当时来自苏联的威胁剧增，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孤立苏联。他对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参见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973年2月17日），外交部[73]办文特1号。

③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详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页。

④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于1979年1月曾对美国总统卡特明确指出：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

⑤ 宫力：《毛泽东“一条线”构想的形成及战略意图》，载李捷主编：《毛泽东思想研究》（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92页。

⑥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973年2月17日），外交部[73]办文特1号。

当时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尽管还存在某些缺陷和某些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例如中国当时对于爆发战争危险的估计过高，对于苏联社会性质的认定有较大偏差，但这些不足之处不会从总体上影响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深远意义。中国在调整中维护了国家安全，打开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通道，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历史性的转折：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外交形成良性互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①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与此同时，中美建交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1978年12月1日，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与会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由邓小平向他们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在考虑的重大问题，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实现与美国正式建交。在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关头，美国坚持建交后仍要向台湾地区有选择地出售武器，这一问题卡住了中美建交谈判的进程。邓小平亲自出马并当场拍板：搁置争议，先行建交，保留重新提起这一问题的权利。^②他还做了党内一些老同志的工作，强调指出，中美建交“确实是个大局”。^③这是因为，此时改革开放的蓝图已在他的心中形成，而美国则是对外开放的最大对象，如果不对美国开放，对外开放至少要打一半的折扣，这就是“大局”。为适应这一巨大的转折，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外交要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经济因素在当代中国外交中的分量空前加大，这是过去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深刻变化。中国借助对外交往的扩大和中美建交创造的良好外部环境，吸收了大量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学习了先进的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② 邓小平对美国谈判代表伍德科克说：如卡特总统对外说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我方不同意。如卡特谈话涉及此事，中方也要立即表态。现在要避免不谈，“以后我们双方再来讨论”；但“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③ 《邓小平与李先念、许世友、李德生等人的谈话》，1978年12月1日，参见宫力：《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北京：红旗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页。

学观念和管理经验，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变革。

随着中国将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邓小平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①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个真正大的问题的战略观点。他在会见日本工商会议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②。中共十三大将邓小平的观点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③。中共十四大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④。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⑤。在此之后的中共十六大直至十九大都重申了这一观点。

中共对时代主题认知由过去的“战争与革命”调整为“和平与发展”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改变，由此带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认定和平因素超过了战争因素，并成为时代主流，让中国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顺理成章展开了全方位和平外交，为国内如火如荼的现代化建设创造出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其次，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成为核心，极大地坚定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促使中国在国际上努力沟通南北关系，并成为沟通南北之间的桥梁，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美苏全球争霸态势发生的变化，中国对对外交战略进行了巨大调整，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中共十二大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⑥由此拉开与美国的距离，但坚持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原则基础上改善、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松动了与苏联的关系，在消除影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② 同上，第10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9-40页。

响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大障碍的基础上，改善同苏联的关系，逐步实现与苏联关系正常化；同时改善同受美苏影响较大的国家的关系，从而做到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开展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由此在美苏争霸的格局下，中国最早地成功退出冷战，不在美苏之间选边站队，采取一种超脱的立场，左右逢源，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具有深远意义的基本国策，也是中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走出的关键性的一步，不仅改变了国内的陈规陋习和落后面貌，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观念得到进一步更新，^①有效地增进了中国与各国的沟通和友谊，加快了我国顺应时代潮流的步伐，加速了我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历史进程。在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的适应过程中，我国逐步改变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共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②十二届三中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③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的观念；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④1992年6月，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⑤的新概念，并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得到确认。江泽民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⑥这一深刻变化不仅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而且使我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找到了共同点，而这对我国全方位和平外交的深入开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我国开始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努力学习和适应国际规则。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WTO，在履行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同时享有相关权利，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我国

① 邓小平在1978年10月说：“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3页。

⑤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02页。

⑥ 同上，第226页。

外交政策建设性的调整也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外交形成了良性互动，中国与国际社会逐步形成良性循环。中国不断地从各种国际合作中受益，同时也在国际合作中以自己的方式对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全方位地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展开。

五、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空前紧密，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向全方位、多层次纵深发展。在应对新时代新情况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2013年3月，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①这种人类命运相互依存度的日益加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依据和客观要求。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先后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②“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③“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④“打造金砖国家利益共同体”^⑤等战略构想。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正式提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⑥由此引起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共鸣。2017年10月18日，他在中共十九大上向全世界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⑦这里概括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是五位一体的整体构想，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当今世界向何处去的新的蓝图。

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世界各国利益交织、命运休戚与共，谁也离不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72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54页。

③ 同上，第60页。

④ 同上，第205页。

⑤ 同上，第224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22页。

⑦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开谁。许多全球性问题复杂尖锐，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大规模的传染性疾

病等，仅靠一个国家的单打独斗是难以解决的，必须依靠全人类整体协作的力量。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要突出人类的整体性和共同利益，顺应时代潮流和世界人民的呼声，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整合人类根本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的共同点，以此来“实现共同体内个体与集体的有机统一”，^①从而达到双赢和多赢的效果。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视野下的世界政府或世界共和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承认主权国家差异的前提下，强调人类的整体性，是差异观与整体观的有机结合。”^②这是一种新的政治观念，吸收了中国传统“和合”^③文化的精华和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④思想火花并在此基础上有了全新的阐述和理论升华。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昌盛也需要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将“中国梦”与“世界梦”巧妙地结合起来，寻求中国与世界共赢的理念。“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⑤体现出中国与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决心和意志。中国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倡者，更是实践者。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当今的世界，存在着全球性问题爆炸式增长与全球治理严重不足、治理赤字庞大之间的尖锐矛盾，“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中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更是推进变革的力量。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性议题的研究与讨论，并以开放的姿态与其他国家和多边组织加强对话沟通，相互学习借鉴，同时提供中国方案，以此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完善，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必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

① 刘建飞：《引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版，卷首语第2页。

② 当代中国外交编写组：《当代中国外交》，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325-326页。

③ 见《史记·循吏列传》：“施教导民，上下和合”。

④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45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先后提出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起一个全球性的务实合作平台，从而“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①中共十八大以来，共建“一带一路”逐渐从倡议变为行动，从理念转化为实践，成为开放包容、务实合作平台和受到各方普遍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共享机遇、共迎挑战、互通有无、优势互补。2013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累计超过6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顺利落地，中国与许多国家发展战略顺利对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快速提升，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形成了各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局面。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反映了当今世界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客观需求，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向心力。2017年12月1日，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世界政党史上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盛会，来自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共600多名中外代表参加了会议，表明了世界各国政党、组织对这一议题的高度关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和追求，因而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和协调合作，共同“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②引领这一潮流，既是新时代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负的国际责任，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普遍的期待。

六、结语：当代中国外交70年的经验与启示

温故而知新。回顾当代中国外交70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过的艰难奋斗历程，有以下几点基本经验和启示值得注意。

首先，与时俱进和外交理论创新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引领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起就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局面，中国外交经历的每个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形势、对手和合作伙伴，需要与时俱进，区分不同的情况，采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89页。

②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第1版。

取不同的战略、策略和应对方针，中国外交内容也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对时代主题认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改变，使中国外交面貌焕然一新，说明理论创新对外交实践具有强大的引领效应。中国外交宗旨的与时俱进，更为贴切地应对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政治智慧，也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实现了转化与更新。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外交理论，不仅成为推进外交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也在世界层面上作出了外交思想上的新贡献。

其次，要把反对霸权主义与同有霸权行为的国家发展正常国家间关系严格区分开来。一般来说，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国家通常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国，如何处理好同它们的关系始终是当代中国外交需要面对的一大难题。在20世纪60代，中国坚决顶住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压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但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方面，没有留下足够余地，缺少一定的灵活性，在反霸的同时，连同这两个国家一起加以反对，这对中国的国际环境改善极为不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日渐成熟，对霸权主义，我们依然要坚决抵制，谁搞霸权，我们都反对，但尽量做到斗而不破、争而不裂，生意照做，国家间的关系照常开展。这是中国外交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对于构建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结伴而不结盟有利于增大中国的发展空间和外交回旋余地。20世纪80年代，中国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果断结束了中国外交结盟或准结盟的历史，在所有大国中率先退出冷战，增强了世界和平的稳定性，也有利于中国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开始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伙伴关系。迄今为止，中国已同各国结成各种不同层次伙伴关系近百个。这种伙伴关系彻底摆脱了冷战思维，不拉帮结派，不针对特定国家，大家一起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中国公开宣布，欢迎他国搭中国的便车，搭中国便车的国家越多越好。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扩大了中国的发展空间，增加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并使中国外交处于主动进取的地位。

第四，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①世界大变局和中国日益走近国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43页。

际舞台中央，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现实依据。大国外交是中国的新定位，当今中国已不仅仅是亚洲大国和区域性大国，更是具有全球辐射力和影响力的世界性大国。开展这样的大国外交需要有全球视野、全球布局，还需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中国的大国外交与传统的大国外交相比，要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工作和国际战略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体现在外交大权在中央，由党中央统筹制定中国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并通过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领导实施；二是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根本遵循；三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总结当代中国外交工作经验并结合新时代新特征形成自己独特的外交风格和行为方式；四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永远不扩张、不称霸。这些特点必然让中国在世界面前树立和平友好的国际形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有两个方面：对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争取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互为一体，而且同时推进。这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担当，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

(作者简介：宫力，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北京，100091)

收稿日期：2019年2月

(责任编辑：刘 玉)

Contemporary China's Diplomacy: 70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Gong Li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ce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contemporary China's diplomacy. The shift of the purpose of China's diplomacy from "opposing hegemonism and safeguarding world peace" to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and promoting common development" and the benign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are in line with China's changing perception of and gradual adaptation to the themes of the times from "war and revolution" to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the mankind has become the core concept of China's diplomacy. Seventy years of China's diplomacy shows that the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of diplomatic theory have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fighting against hegemony and maintaining normal relations with hegemonic countries; a new path of external relations characterized by partnership rather than alliance has expanded China's diplomatic space; China must pursue a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Independence; China's Diplomatic Purposes; Diplomatic Changes; the Core Concept of China's Diplomacy